

總統 蔣公的社會思想

吳自甦

今天我們中興復國的基地，握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，為自由民主陣容的堅強堡壘，蔣公已為我們鋪好勝利的坦途。要在我們精誠團結，堅定樂觀；任何克服困難的答案，俱可恭讀蔣公遺訓、遺書得到確切可行的方案。大家相勉行健不息，終必有志竟成。（蔣公精神與我們同在）

一位義人和信徒逝去之後，他的蹤跡雖遠，但人世的天堂，仍為他的光明所照耀，這種人音容宛在，是永遠不朽的。當他離去之時，他的身後遺留下了許多代表他的人，來繼續完成他的未竟之志。（蔣公證道詞）

參與社會 體驗生活

社會思想基於時代與生活，自有其歷史背景與社會需求。時代愈艱難，需求愈繁多，則社會思想每每愈豐富。因此，社會思想主要的是由適應社會生活，解決社會問題而產生。任何偉大的思想家，無不殫精竭慮，發潛德之幽光，為人類社會指引發展的方向，而社會思想家則更要參與社會、體驗生活，困心運思，發為議論，方克成一家之言，而對國家、社會和人類造福、貢獻。

奉化 蔣公，追隨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，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豐功偉業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。我人研讀遺訓，尋繹 蔣公的哲思，涉及社會思想者，周詳淵博，亦斷非短篇所能盡，平日課堂講解，多重學術理論探原、鋪陳，今試以抗戰前後為經，社會生活與社會建設為緯，擇取若干要點，深入淺出，恭述如次。

禮義廉恥 轉移風氣

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繼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抵抗日本侵略。蔣公本著攘外必先安內，在此十年（民十七年至民廿六）期間，無論政治、經濟、軍事都在埋頭建設，同時共黨叛亂問題又必須解決。蔣公乃以四維八德號召國人，並提倡新生活運動，以轉移社會風氣，「人民生活之滿足，固有賴於政治之教、養、衛各種制度之盡善推行，但政治上各種制度之推行，與社會風俗習慣之關係，至為密切。……故任何國家於革故鼎新之際，恒以『轉移風氣』為先；蓋其力較政教為尤大，其用較政教為尤廣，而其需要亦較政教為尤急也。蔣公強調此種「轉移風氣」之工作，即所謂新生活的「運動」。至於為何必須實行「新生活運動」，蔣公認為「欲建立人民現代之生活，造成一個新社會，自不能無需於政治，尤其需要教育。……關於政教制度諸問題，政府方從事於改造，自不必贅。值此國家存亡危急之時，吾人苟不願束手待斃者，應不坐俟其自然而推演，必以非常手段，謀社會之更新。質言之，當以勁疾之風，掃除社會上的污穢之惡習，更以薰和之風，培養社會上之生機與正氣，負此重大使命者，唯新生活之運動。」而新生活運動的重點，就是在提倡「禮義廉恥」的規律生活，而表現在食衣住行。禮義廉恥於社會并非節文，亦非僅止於善美的行為，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固須力求整齊、清潔、簡單、樸素，然其資料的獲得應合於廉，品質的選擇應合於義，方式的運用應合於禮，如此三者有一失禮、亡義與不廉之事，即成為生活的污點，皆當引以為恥。人既知恥、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則無不被肯定和推求。由於新生活運動的實行，確切激勵民心士氣，自可轉移社會風氣，使得民族復興，國家進步，奠定

抗日勝利的精神和社會基礎。

重慶精神 勤儉建國

與新生活運動互為表裏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是為促使國人自動改善「國民經濟」。蓋新生活運動為民族的、修身的，着重社會道德與精神，國民經濟建設是民生的、生產的，着重在行動與物質，二者相輔相成。抗戰告捷，蔣公更發起精神總動員運動，認為「若猶不悲愧奮發，急起直追，共同恢復我之固有道德，一致發揮總理之革命精神，集結於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；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；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，三個共同目標之下，掃蕩萎靡腐敗之障礙，養成蓬勃奮發之朝氣，各竭其能，各盡其職，以戮力奮鬥於抗戰建國之大業，將何以自救而救國？」此外，復推行勤儉建國運動，「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以後，又遭遇了兩大威脅，一是奸黨共匪暴力集團的全面叛亂，一是由奸匪叛亂所造成的經濟殘破與社會不平。這兩大威脅能否解除，將決定我們新中國建設的成敗，乃致中華民族存亡的命運。」所以勤儉建國的使命，要在「發揚自立自強自制的精神，實踐勤勞刻苦的工作。」我人檢討八年抗戰全國軍民堅苦卓絕，爭取最後勝利，每曰「重慶精神」有以賴之，而重慶精神之凝聚，實亦內涵蔣公勤儉才能建國的社會思想。

成敗得失 在於社會

俄帝第五縱隊的毛共，奉命其主子而賣國求榮，神州陸沉前夕，蔣公昭告全黨同志：「……國民革命的第三期自抗戰勝利以來就展開了，革命的對象是共產國際第五縱隊之中共匪黨，革命的本質是社會鬥爭而兼民族與民權主義的革命。這個社會鬥爭，全國國民每一個人和每一家族，都不能自居於鬥爭之外，必須就生死榮辱和自由與奴役兩者之間有所抉擇，因為一個國民，每一個家庭和整個社會生活方式，家無論貧富，人無分男女，家家已為共匪清算之對象，人人都是共匪鬥爭的目標，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——全體一致都已捲入了這一次社會與民族文化鬥爭之中。」蔣公乃剴切的指出：「目前反共的戰爭，是反侵略主義的民族戰爭，也是反極權主義的民主戰爭，更是為了每一個國民，每一個家庭自由生活的社會戰爭。」所以「只要在反共鬥爭發生進展的處所，就是本黨組織發展的基地。」此為就反共的空間而言，又曰：「凡是熱忱愛國堅決反共的同胞，就都是本黨的同志。」此乃指反共組織的成員而論。再就社會的心理基礎，反共必須恢復民族精神，砥礪民族氣節，正因為「反共戰爭乃是為了每一個國民，每一個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會鬥爭，同時也是為了保障我們悠久的歷史，崇高的倫理和仁愛為中心的道德的文化戰爭。」「所以反共戰爭雖然是民族、民主的戰爭，但其成敗得失，不決定於軍事與政治，而取決於社會與文化。」

革命實踐 從頭做起

在民族復興基地的台灣，蔣公澈底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理想，毅然施行土地改革，繼而倡導革命實踐運動。「中華民族遭逢有史以來未有之危機，我等對於當前反共抗俄救國保種之責任，既無可旁貸，而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之事業，更得從新做起。」「反共抗俄戰爭，為持久之總體戰，必須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軍事綜合運用，始能克服當前之危機，達到最後之勝利。」而革命實踐運動的基本思想是：1. 為民族生命而犧牲個人生命。2. 為人民自由而貢獻個人自由。3. 為群眾生活而節制個人生活。影響所及，社會和軍中先後發起克難運動、毋忘在莒運動，而國家施政，於社會建設則被列為重要的一環。

輔導就業 保障生活

蔣公是 國父的忠實信徒，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」，尤為 蔣公社會思想的精華所在。其中無論有關社會安全、社會福利等均有所論述，諸如 1 輔導就業：「在農業社會裏，孤獨並不是嚴重的問題。只有幼年喪失了父母，或是少年破產喪家，或是老年孤苦無依，纔要受宗族鄉里的救濟。到了工業社會，城市生活是發展了，人口流動率是增高了，在家族瓦解的過程中，替社會留下許多孤獨的個人，求業未得，無家可歸，甚至流浪成習，游閑為事，無論是少年或老年，或受過教育或未受過教育，或有職業能力或沒有特殊技術的人，這種游蕩分子漸漸增多，這不僅是貧窮和失業問題，並且是教育和社會問題。」所以近年來輔導國民就業是國家的要政，而政府特設專為退除役的國軍官兵所需要的輔導機構，經常產生對國家社會積極的功能。2 保障生活：「在一個社會裏面，每一個人都能自立自主，人與人之間，又都能互助合作，這個社會才是自由安全的社會。但是一個人為自己生活來工作，為社會國家來服務的時間是有限的。兒童和老年要受人保養，疾病殘廢要受人扶持。如果沒有人保養和扶持，他們便要流離失所。所以我們要建設中國社會為民生主義社會，對於這些問題，就不能不考察其癥結所在，提出其解決方法。」於此，對破碎家庭必須防治，亦為安定社會秩序、保持國民道德。蓋無論離婚、遺棄、死亡的破碎家庭，家人生活固失却保障，惟其給予兒童、青少年的打擊則更是沉重，工業社會嚴重的青少年問題之所以造成，與家庭破碎的關係至為密切，所以保障生活首在於安定家庭和減低離婚率。3 老年問題的解決：「農業社會的大家族，由尊長治理家產，主持家務。老年人在家族裏有權力，在社會上也各依其家族的地位而受人尊敬，只有家破人亡、孤苦無依的老年人，纔依賴宗族鄉里的扶助，但是一個人的學問事功，最大的成就總在晚年，無論是學術家、實業家，乃至老農老圃，對於民族文化和社會經驗，具有權威，為下一代子弟的先導和指針。……我們中國古來『厚生』的設施與『養老』的禮典，就是教育一般國民，尊老敬長，必使其老者能衣帛食肉，不饑不寒，造成社會醇厚敦樸的風氣。」可是工業社會的老年人，年齡已不再是其個人的聲望和社會權威的記號，工業技術講求日新月異，工業勞動的要求是年富力強，我國既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，大家族的瓦解，小家庭的破碎，在所難免，而老年問題自亦形成民生問題， 蔣公在「補述」中特別強調注重研究并予解決。

社會福利 少年問題

其實， 蔣公一向重視家庭，遠在作「大學之道」的訓詞中，就曾講述齊家之道，并指出「這個家字，應當作家家戶戶的家字，就是社會的意義」。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，在社會學者的心目中，家庭是人類生活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一個組織， 蔣公在「補述」中又曾說：「……從大家族到小家庭的演變中，有一個重要的特徵，就是『大家族的職能之分化。』最顯著的是生產分到工廠裏，教育分到學校裏。剩下來的大家庭，既不是生產單位，也不是教育單位，而是一個純消費單位；於是就影響到各方面去，一個人從幼年到老年的各種問題，從前都是家族的問題，現在都成了社會問題，更由社會來解決，這一變動是極大的。」至於問題青少年的產生， 蔣公再作分析：「農業社會大家族制度之下，父權是絕對的，其流弊就是兒童身心受壓制，個性被湮沒。但在工商城市的小家庭中，父母對兒童的權力，更漫無標準，或者輕蔑和虐待，或者放任和怠忽，都不能培養兒童使其成為健全的公民。」為要減少問題少年的產生，社會控制、學校教育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還是在使為父母者，「知道教養子女是父母對子女的義務，也是他們對國家社會的責任。做父母為了履踐這義務和責任，對於兒童要有正當的管教，亦須加倍的愛護。要知

道家庭教育是爲了啓發兒童的心智，校正兒童的習慣。並不是爲了父母發洩情感和濫用威權，任意打罵。所以父母的權力應該以其教養子女的義務和責任做尺度，超過這個尺度，便是濫用威權，要受法律和社會制裁。」由重視青少年問題，我人益見 蔣公的社會思想「語重」而「心長」。

關於一般的社會福利措施，在兒童福利方面，地方政府普遍設公立婦產醫院、兒童教育院、托兒所、兒童保健院；在老年福利方面，重視年老退休問題以及養老制度的建立；在公共福利方面，如健康問題、娛樂問題等等，於「補述」中均有扼要中肯之論，足供我人研討和實踐，爲節省篇幅，不再贅述。

生活規範 高瞻遠矚

針對日益浮華的社會，在五十八年元旦 蔣公又曾昭告國人：「我們要在社會方面，獎勵節儉的生活……創造社會的繁榮，而不爲社會的繁榮所迷失。我們并要從日常生活的自反自發上着手，實踐國民生活規範……更要在教育文化方面，全力貫徹并加強九年國民教育制，推進全面科學教育與倫理道德教育。使每一個國民在對於家庭、社會、人群、自我發展、自我貢獻之中，人人能進取自律，而致於富且泰的境域。……建立一個現代化文明的國家……一個現代明禮尚義、守法知恥的社會。」由於國民生活規範的實踐和延長國民教育爲九年，乃加速我國由農業社會轉進工業國家的歷程，舉世爲之刮目相待， 蔣公真知灼見、高瞻遠矚的社會思想，在在造福中華

俄共螟蛉 非我族類

反共戰爭本質固屬社會戰爭，但對僞裝民族主義之毛共僞政權，則必須剖析其絕非民族主義者，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，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」。中共黨徒「乃是貌似而實異的非中國人」。 蔣公明辨「中共」漢奸與中國歷史上的漢奸不同，因爲歷史上的漢奸雖賣國求榮，但沒有喪失民族性，而中共漢奸以爲馬列主義作僞政權的教條；毛賊以馬列的階級理論，竟認爲我中華民族是資產階級民族，他們則是無產階級民族，毛共的民族性既經改變，其當然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國人。這對研究社會思想的學者來說， 蔣公的謹論自有其不朽的價值。而今我人再回念 蔣公三十年前的文告：「……我們當前的情勢，固然是險惡的，我們今後的戰鬥，亦是艱苦的；但是我們認識了今日剿匪作戰，是反侵略的民族戰爭。同時也是每一國民，每一家庭自由生活的社會戰爭，和保障悠久的歷史、優秀的文化、和平仁愛的倫理道德的文化戰爭。」當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日 蔣公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也正基於對敵的文化戰爭，而文化乃社會的核心，復興文化其目的即在重建社會。（爲篇幅所限，擬另撰 蔣公倫理與文化思想，而再論述）更何況針對中共破滅社會組織所實施的「人民公社」暴政，和斬斷歷史文化的「大革命」，我復興中華文化，益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復興文化 繼承道統

蔣公的社會思想乃繼承中華道統和 中山先生的民生哲學， 蔣公的理想社會亦即 國父所言之「大同社會。」但「禮運篇的大同社會，並不是我們一步可以達到的。」（關於大同、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的辨解，請另參閱拙稿「 國父社會思想萬古常新」）務必先由小康而進大同。蔣總統經國於行政院長任內爲轉移社會風氣，和國家十大經建所作的努力，惠我民生，成果豐碩，在在冀求實現自由民主、安和樂利的社會理想，亦即先求小康，再進大同。經國先生他又特別一再強調經濟發展的原則，是要縮短貧富距離，造成均富的完美社會，甚至「寧願經濟緩慢發展

，而力求縮短貧富的差距。」再如大量增建國民住宅，以及十大建設完成後所擬議的第十二項建設，與社會精神文化建設相關，這都是符合民生主義要旨，也充分說明經國先生確是 蔣公社會思想和遺訓的忠貞、篤實、最有力的實踐者， 蔣公的社會思想在在為造福華夏，相信建設復興基地，進而光復大陸國土的重責大任，我人必能在短期內為之功成，真正做到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。